

【一般论文】

论王安忆《考工记》的“人生建筑”

On the ‘Architecture of Life’ in Wang Anyi’s *Kao Gong Ji*

柯欣汝* (香港浸会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

Ke Xinru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ong Kong

Email: 22482725@life.hkbu.edu.hk

Published online: 03 OCTOBER 2024

To cite this article (APA): Ke Xinru. (2024). 论王安忆《考工记》的“人生建筑”: On the ‘Architecture of Life’ in Wang Anyi’s *Kao Gong Ji*. *ERUDITE: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Education*, 5, 22–37. <https://doi.org/10.37134/erudite.vol5.Sp.2.2024>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37134/erudite.vol5.sp.2.2024>

摘要

《考工记》是大陆知名作家王安忆在201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它营造了一个叫做陈书玉的上海男人及其祖宅的生命史。在这里，中国古典建筑与现代中国人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是值得注意的。本文将“人生的建筑”概括这种关系，指向人与建筑间的息息相通。本文的中心议题是：作为现代人的陈书玉在其生命各个阶段和古典建筑之间的关系具体是怎样的？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精神如何影响人与人生建筑的变化？面对死亡之际，实用理性精神的“能”与“不能”又在哪里。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选择以存在主义和人文主义地理学辅助论述“人生的建筑”，这两种理论皆强调现代人的情感、感知，而情感、感知，又是现代人的核心深度。

关键词：《考工记》；人文主义地理学；空间；人生的建筑；王安忆；实用理性精神

* 柯欣汝，香港浸会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城市文学、海派文学、岭南文学。偶尔热衷文学创作，曾获香港大学文学奖。

Abstract

Kao Gong ji is a full-length novel published in 2018 by renowned mainland China author Wang Anyi, which creates a life history of a Shanghai man called Chen Shuyu and his ancestral home. The interplay between classical Chinese architecture and modern Chinese people is noteworthy. This paper will summarize this relationship with the ‘architecture of life’ concept, pointing to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people and architecture. The central theme of this paper is: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dern man Chen Shuyu and classical architecture at various stages of his life? How does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pragmatic rationality influence the changes ‘architecture of life’ and man’s life? In the face of death, what’s the possibility and impossibility of the pragmatic rationality. In terms of research methodology, this paper chooses existentialism and humanist geography, both of which emphasize the emotions and perceptions of modern people.

Keywords: Kao Gong Ji , Humanist Geography, Space, Architecture of Life, Wang Anyi, pragmatic rationality

一、前言

《考工记》是大陆知名作家王安忆在201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和《长恨歌》、《富萍》等小说一样，作家将故事发生的背景放置在处于中国现代化前沿的上海，钟情于上海弄堂日常化、私人化、凡俗庸常的生活空间，显露与上海的历史、政治若即若离的姿态。

小说写的是一个名为陈书玉的上海男人，从年轻到暮年，从中国抗日战争到改革开放，终其一生居住于他的祖宅、修复他的祖宅的故事。正是在这样的脉络中，祖宅——也就是古典建筑——的位置无比突出。这令人想起《天香》里由盛而衰的天香园、愉园。从共时性层面，《天香》与《考工记》共同佐证了王安忆长久经营的以物观时、以物观世、以物观人的写作方式，¹从历时性层面，又能见出王安忆在书写传统建筑方面的拓进。²

当然，在中国当代小说中，书写传统建筑的作家不止王安忆，陆文夫笔下苏州的窗（〈临街的窗〉）、苏州的围墙（〈围墙〉）、苏州的小院（〈美食家〉、〈圈套〉）是一例，金宇澄《繁花》里常州的徐府是一例，苏童《黄雀记》中的被误用为监狱的古典园林又是一例。《考工记》特出之处，在于传统建筑不再作为人物舞台的布景（苏童《黄雀记》），也不仅仅反映人物的某个人生阶段及（或）此阶段的心理侧写（陆文夫的小巷系列、金宇澄的《繁花》），它表达了人终其一生与建筑之间休戚相关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恰恰是中国古典建筑的要义所在。

本文尝试以“人生的建筑”概括此种精髓。“人生的建筑”是台湾学者汉宝德在《中国建筑文化讲座》里提到的概念，汉宝德认为：

在中国文化里，建筑并没有客观存在的价值；它的存在，完全是为了完成主人的使命。除了居住的功能外，建筑是一些符号，代表了生命的期望。

建筑与人生一样是有其寿命的，它随着主人的生命节拍而存在。因此使用可以腐朽的木材，要比使用不会腐朽的石头，更有生命的意义。³

可见，中国木质建筑是随着主人的发迹可至千窗万户，也会因主人家族的衰败而倾圮、腐烂。王安忆将小说取名“考工记”，也有这样的意思在。王安忆在后记里说：将小说题作“考工记”，一是顾名思义，说明这本书围绕修葺房屋展开；二是以《考工记》官书的身份，反讽小说稗史的性质；三是书写一个人在上世纪

¹ 周保欣，〈“名物学”与中国当代小说诗学建构——从王安忆《天香》《考工记》谈起〉，《文学评论》，2021年第1期，页68。

² 《天香》中虽有精细的建筑描写，但未限于建筑，刺绣、饮食、服饰都是王安忆关注的“物”。《考工记》却几乎将建筑做为唯一的“物”。

³ 汉宝德，《中国建筑文化讲座》（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页27。

最为动荡的中国社会，磨砺和修炼自身，使之纳入穿越时间的空间，也许算得上一部小小的营造史。⁴ 第一、二点的意义一目了然，有意思的是第三点，所谓“穿越时间的空间”，说的就是陈书玉的祖宅，而将经历磨砺和修炼的自身纳入其中，成为一部（完整的）营造史，翻译成“人生的建筑”的语言，就是在表征建筑和人之间融合状态，也是在说人在建筑中自我显现、建筑在人的存在中自我显现的过程。

需要注意的是，汉宝德所谓“人生的建筑”含纳的是传统中国人，而在《考工记》，陈书玉却是一个现代人。传统的中国乡土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亲疏关系呈现为差序格局，差序格局即人伦，是人以“己”为中心，按照君臣、父子、贵贱、亲疏、夫妇、长幼、上下等级秩序，划定一圈圈向外扩展的社会关系。⁵ 而在《考工记》，陈书玉甫一出场，我们就发现他和家人不亲。彼时陈书玉的家庭成员复杂，他虽为独子却也常被忽视，想起祖父，连面容都是模糊的。与之相对的，是他在外交游甚广，不仅总跟朋友白相，连去读大学，有一半也都是为了交朋友。可见陈书玉织罗社会关系，并非按照差序格局而是按照自身的情感，正如泰勒(Taylor Charles)指出西方现代人的“自我认同”(identity)，自文艺复兴以来便是具有内在与深度的“自我感”(sense of self)。

但同时，陈书玉的“自我”又和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精神有结合、有龃龉。李泽厚认为，实用理性可谓儒家乃至中国整个文化心理的重要特征，它首先指的是理性精神或理性态度，极端重视现实实用，重视现实的可能性，轻视和贬低“无用的”抽象思维。⁶ 人生的建筑就是中国人实用理性的产物，它关注现世的生活，从不追求西方建筑那样的永恒，也就是说不作任何抽象的与死亡有关的玄思。由此，笔者想要探寻的是，作为现代人的陈书玉在其生命各个阶段和古典建筑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人生建筑如何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保有现代人的自我？而当一个现代人面向死亡，希冀通过保存建筑来保存家族历史时，木质建筑的“能”与“不能”又是什么？

在具体论述过程中，笔者将以陈书玉的不同人生阶段为线索，逐次分析他与人生建筑之间的关系。此外本文也将使用存在主义和人文地理学辅助论述“人生的建筑”。存在主义和人文主义地理学皆受现象学影响，强调人对生命/空间/地方/世界的情感、知觉，而情感、知觉又恰恰是构成现代人的核心深度，这契合了陈书玉现代人的身份。

⁴ 王安忆，《考工记》（台北：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8），页 279。

⁵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页 34。

⁶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页 26；李泽厚：《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页 12。实用理性如何在孔子和孔门弟子那里持续阐发，亦可参照这两本书。

二、出生—1949：从空间到地方

前文提及，《考工记》的主人公陈书玉是一个现代人，从出生开始，就面对着传统家庭溃散的伦理，这一事实展现在人与建筑的关系上，则表现为空间。空间在文化地理学者那里，通常要与“地方”相互定义。⁷相对于地方，空间意味着（对个体而言）缺乏意义。段义孚(Yi-Fu Tuan)指出，空间比地方更为抽象，从地方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来看，空间是开放、自由和威胁。⁸Tim Cresswell也认为，空间是缺乏意义的领域，是「生活事实」，跟时间一样，构成人类生活的基本坐标。⁹

1944年以前，祖宅对陈书玉而言是个没有认同感的空间。这首先从上海三一八事变后他选择留在上海的理由中可以看出。彼时陈书玉的学校计划南迁，陈书玉选择了留下，原因有很多，却没有一个攸关他的家庭。其次，当1942年陈书玉为了避开舞女采采的追求而动身去重庆，重庆艰难的生活也从未令他思念自己的家庭，日子都围绕着口舌之欲打转；离开重庆的契机，也仅仅源自学校准备再次迁移，他索性走个彻底。

由此可见，这时候的家宅对陈书玉而言根本不是“地方”。段义孚认为，在灵长动物中，人类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把家作为地方的意识。¹⁰“地方”是什么？是感知价值的中心，养育和支撑的中心，是安全、稳定、永恒的保障，而“人”是地方的价值焦点和意义之源。¹¹很显然，陈书玉那个没有提供亲切和抚育经验的家宅，其实是一个自由、开放、不稳定的空间，仅仅提供居住的“生活事实”。

然而到了1944年秋天，陈书玉回到因集体避难而完全空下来的宅子时，他的态度已经开始转变。这从他二十多年来第一次发现了自家防火墙的静美就能看出来。¹²试想，这堵防火墙过去不美吗？应该也是美的，只是无法打动陈书玉。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认为，建筑在创造幸福的能力方面是极不稳定的，也许只有当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烙上了无法抹去的印记，建筑才会开始给予我们某些货真价实的影响。¹³的确，这时候的陈书玉，比起两年前，已经经由战乱有了不少悲痛的经历，正是这些经历，才能让他第一次被建筑的美触摸到；也是

⁷ 段义孚，空间和地方的思想要求它们相互定义。【美】段义孚著，王志标译：《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页3。

⁸ 同上注，页3。

⁹ Tim Cresswell 著，许苔玲、王志弘译：《地方：记忆、想象与认同》（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页19。

¹⁰ 【美】段义孚著，王志标译，《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页111。

¹¹ 段义孚，《空间与地方》，页112。

¹² 书里写：「面前呈现一片白，这一片白仿佛无限地扩大和升高，仰极颈项，方构着顶上一线天，恍然悟到，原来是宅院的一壁防火墙，竟然还在——从前并不曾留意，此时看见，忽发觉它的肃穆的静美」。王安忆：《考工记》，页7。

¹³ 【英】阿兰·德波顿著，冯涛译，《幸福的建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页11、16。

第一次，建筑向主人公彰显了它抚慰人心的力量。

空间从这里开始变化，但要真正成为“地方”，还需要真实的生活经验。经验包括感觉、知觉、观念，它是建构现实的基础，也是赋予地方以特色的重要条件。¹⁴ 陈书玉的经验主要由两方面构成。第一是他在家中位置发生改变，并对家人产生了责任感。前文提及陈书玉在家中一度不受重视，更喜欢在外交游。但是到了1945年，由于避难的家人陆续回来，身为家中唯一的晚辈和壮年，陈书玉自动担起了照顾家人的责任，比如排队买户口米和煤。与之相对，是他知交半零落，过去的好友要么结婚或消失，要么忙于营生，使得陈书玉或主动或者被迫，有了大把和家人相处的时光，感情或多或少培养出来了。

第二是关于祖宅的“知识”（观念）增加了。家中人口变多，龃龉也多，为了躲避争吵，陈书玉躲进祖父的屋子学书法，他由此开始从祖父那里得知祖宅（可能的）的来历、形制及其中轴线、雕饰的形象与风格。段义孚认为空间知识不是必须的，却可以增强空间能力，空间能力能体现我们对地方的依赖度，当我们对空间感到完全熟悉时，它就变成了地方。¹⁵ 陈书玉从祖父那里得来知识，后企图以北极星来为祖宅确定方位，在祖父大寿的晚上注意到宅子的雕饰（屋脊上的脊兽），何尝不是在反复实践空间知识，并形成对地方的感知。

家屋就此成为了地方，但这样的地方仍限于经验，如果地方要有其形象，则必须从外部审视。¹⁶ 陈书玉第一次“看”到“地方”，是某日下班回家，看见自家的宅子，在蔓延的棚屋间，宛如海水中的礁石，或者礁石上的灯塔，孤立其中，茕茕孑立。上海的棚屋是近代饥荒与战乱的产物，生活着大量难民。在19世纪晚期，棚屋主要聚集在黄浦江两岸，20世纪初扩及至杨树浦、曹家渡、闸北。¹⁷ 到1920年代棚户区已经占满中山环路两旁、火车站和苏州河两岸码头附近及中小工厂周围的空隙地。¹⁸ 对租界和华界的官员而言，棚屋是上海的污点，因此总是想方设法拆除，如1845年租界就曾颁布《土地章程》，规定禁止搭建棚屋，也就让拆除棚屋合法化。¹⁹ 然而大量移民涌入所导致的住房紧张，注定让清除棚屋计划成为徒劳。当国共内战，大量苏北难民涌入上海，难民收容所不堪重负，于是很多人都利用空地私建棚屋。1946年6月，有部门指出：“南市、闸北一带地方常有人在空地建筑房屋，事前既不呈准主管机关核给营造执照，复不问产权谁属，擅自兴建，且有建筑竣事即将该屋转卖情弊。拟此不顾法令，任所欲为，日后纠纷势必层出不穷，函应严加取缔，以杜流弊。”²⁰ 陈书玉的祖宅就在南市，他眼

¹⁴ 段义孚，《空间与地方》，页7-9。

¹⁵ 段义孚，《空间与地方》，页59-62。

¹⁶ 段义孚，《空间与地方》，页14。

¹⁷ 【美】韩起澜著，卢明华译，《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页42。

¹⁸ 施宣圆主编，《上海700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页294。

¹⁹ 韩起澜：《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页44。

²⁰ 《关于工务局临时棚屋建筑办法及上海市棚房禁建区域图》，上海市警察局闸北分局档案 Q 145 - 4 - 156，上海市档案馆藏，转引自蔡亮：〈近代上海棚户区与国民政府治理能力〉，《史

前所见，便是国共内战所带来的棚屋四处搭建、“复不问产权谁属”的混乱后果。然而当身为本地人的陈书玉看到棚屋和自己的宅子产生地界冲突，他没有直接给出韩起澜所谓的中国精英集团（本地人）的傲慢、歧视，他的反应是：

始料未及的，一阵心惊袭来，他感到了危险。就在这同时，他看出了老宅的美。他向来不喜欢中国建筑的形制，觉得阴沉和冷淡，也许是心境相合的缘故，他忽就领略到一种萧瑟的肃穆的姿容。²¹

陈书玉所感到的“危险”，表面看是棚屋带来的，而其根本，却是时局带来的。与其说棚屋多如潮水，不如说灾难多如潮水。所谓的地界冲突，与其说是老宅与棚屋的冲突，不如说是混乱与肃穆之间的冲突、拥挤与萧瑟的冲突。既然冲突不断，宅子却遗世独立，陈书玉忽然认同了宅子所代表的立身之所、处世之道，“地方”由此凸显。²²

三、1949年—1976年：人生建筑及其背后的实用理性精神

我们可以不假思索地同意陈书玉在战乱年代认同了他那相对稳定、安全的祖宅，空间变成地方。然而细究认同背后的原因，已经和实用理性精神有关。它表现为陈书玉拒绝思考棚屋所代表的流离乃至死亡；也表现在当陈书玉依靠北极星来确认祖宅的朝向时，因星空感到无限的空茫，空茫中感到害怕而回屋去了。可见宇宙或者天国对于主人公而言都是空想，祖宅才是伦常日用，充满柴米油盐，是人世中可以追求的道体。²³ 这一点，在陈书玉 1949-1976 年间和他祖宅的关系中更为显著。

首先它表现为修正祖宅的用度空间。这和时代的大背景有关。1949 年解放军进驻上海后，上海政府曾响应中央展开了“镇反”（镇压反革命）运动，大虞父亲因曾从国民党大员手里接收了私藏的日产（海南檀明式听堂家具）而致入狱。实际上，这场运动主要针对的反革命分子包括特务、国民党残留势力、恶霸、地痞、流氓，大虞父亲入狱多半是与国民党而非家产有关。然而“镇反”终究是“以激发底层民众‘阶级’仇恨和翻身渴望为中心的政治动员”，²⁴ 因此大虞敏

林》，2009 年第 2 期，页 28。

²¹ 王安忆，《考工记》，页 34。

²² 段义孚在论及地方的创造时，认为要使得地方变得可见，有以下几种方式：（一）与其他地方发生竞争、冲突；（二）在视觉上制造突出之处；（三）利用艺术、建筑、典礼和仪式感所产生的力量；（四）使个人生活和集体生活的愿望、需要和功能性规律为人们所关注。段义孚：《空间与地方》，页 134-147。

²³ 中国实用理性在「体用不二」（「天人合一」的另一种提法）中体现，在中国哲学中，天不大而人不小，“体”不高于“用”，“道”即在“伦常日用”、“工商耕稼”之中，“体”、“道”即是“伦常日用”、“工商耕稼”本身。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页 326。

²⁴ 杨奎松，〈新中国巩固城市政权的最初尝试——以上海“镇反”运动为中心的历史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5 期，页 1。

锐地觉察到“有产”的危机，他提醒陈书玉：“如今是无产者的天下，有产就是有罪，我担心你家的宅子……”。²⁵ 于是，在新气象下，陈书玉渐渐感到那宅子显得不合时宜：

厅堂的高、大、深，本是威严和庄重，但时代是奔腾活跃，一派明朗，于是就衬托出晦暗。木质结构的房屋，紫檀的幽微的光，彷彿古尸身上的防腐剂。²⁶

如果说，过去宅子里的人以实用的精神与建筑同心同德地生活，那么如今，政治的浪潮隔着大虞父亲、以及后来朱朱的入狱消息传递过来，加之早前“镇反”所建造的监管形式，²⁷ 令宅子所有值得称道的部分：形制、装饰、来历、面积，都变得可疑乃至有罪，住在宅子里人也成了罪人。

空间被解码及重新编码了。列斐伏尔认为，所有的编码中，都包含着某种赌注和某种意义的生产。这种意义可能会取代给出的文本，而且要么会让它变得贫乏，要么会让它变得丰富，从而增加它的价值，由此就产生了“含混”。²⁸ 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生的建筑”变得贫乏的一面：生活机能大大降低。它不再让人感到舒适、安全、满足，而是威胁、紧张、压抑：

他们说话行动都压着声气，蹑着手脚，空间的开阔没有让人自由，反而处处受制，约束得紧。²⁹

用福柯“凝视”的观点来看，这是一个充满政治意涵的空间，时时刻刻都在规训人的身体。时局透过建筑显露出来，显得强大无比，危险重重，为了抵抗这一现状，陈书玉修正了祖宅的功能。他请煤气和自来水公司将管道从灶间接进楼里，开辟出一块地方，做厨房兼饭堂，使得一应起居都在内天井里进行，减省腿脚劳力，也缓解些空旷的压迫。³⁰

这就是人生建筑的体现了。汉宝德认为，中国的建筑通常以“三间房子”作为基本居住单位，偌大的空间其实会降低居住人的舒适度，因为时间是不能扩张的。如果仅仅考虑时间，能在一个房间里完善地解决多种需要，事实上是最理想、最便利的生活空间。因此，中国人对于居住空间扩展的要求，不是基于功能，而

²⁵ 王安忆，《考工记》，页 61。

²⁶ 王安忆，《考工记》，页 74。

²⁷ 解放后陈书玉最初在立志小学谋职，小学被政府接收后，教师们需要重新填写职员表，表上需要说明“成分”。见王安忆：《考工记》，页 70。“成分”档案是“镇反”运动建立的监管形式，目的是为了严密监控继续在社会上生活的或公开或隐蔽的有政治问题的分子。这也成了后来“黑五类”、“红五类”的前身。杨奎松：《新中国巩固城市政权的最初尝试》，页 14。

²⁸ 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页 11。

²⁹ 王安忆，《考工记》，页 125。

³⁰ 王安忆，《考工记》，页 123-124。

是基于情趣。³¹ 陈书玉的祖宅，原先住了家中几代人，人元气旺，并无太多空间上的负担。然而此时族人大多流散，充满雕饰的厅堂、走廊又不合时宜，因此修改建筑的功能，将起居限缩在天井内何尝不是讲究对现世生活的积极进取，同时也体现人生建筑通融、实用的一面。³²

除了修正建筑的用度空间，陈书玉用于抵抗建筑空旷的方式更能体现人生建筑及其背后的实用理性精神。在祖父母去世后，陈书玉父母不堪空间的压力，投奔大妹妹家。陈书玉变成一个人，整个宅子空荡荡的，这是地方再度退化为空间的标志，它不再令人感到熟悉与放心，个体在偌大的空间对照下，显得渺小与微不足道，孤独油然而生。³³ 他去向居委会报告：“自家祖屋，足够开一间学校，自愿交给政府”。³⁴ 然而政府早就想好了，要在这里开瓶盖厂。1958年瓶盖厂出来后，直接造成房子物质上的破坏。大虞从川沙来南市看陈书玉，走进宅子里，从插樨和风气的角度，判定宅子建造年代为清朝。而后，大虞说：

进院子时候，看地坪的青石板，有几块碎得厉害，大约是机器运送碾压，过廊上的歇山顶也损了好多片，这木质的建造，到底抵不住铁物，五行是说“金克木”？³⁵

《清式营造则例》也提到，建筑的坚固，不能脱离材料的本质而论，只要建筑不违背材料的合理结构原则，运用通常的智识技巧，使其在普通环境之下（兵火例外）能有相当永久的寿命。³⁶ 很显然，瓶盖厂作为隐喻上的“兵”，也即“金”，³⁷ 破坏了宅子的合理结构原则，加速了它的倾颓。

可是，这再次体现了人生建筑灵活的特点。中国建筑本身就是为了人的生活、福祉而存在。因此，当时代变迁，它的内涵不再符合居住者的需求时，对建筑进行适当的修改，也是一种必要。房子改造的效果出来了，书里写：

他（陈书玉）不像以前害怕和嫌恶着宅子了，多少是瓶盖厂所赐，机器的轰鸣，脚步的杂沓，填充了空间，而他呢，是这喧哗中的一个静谧。周围

³¹ 汉宝德，《中国文化建筑讲座》，页220。

³² “中国室内空间是很单纯通融的”。汉宝德：《中国建筑文化讲座》，页221。通过修正功能而体现人生建筑及其实用理性精神的例子还有：陈书玉曾出于恐惧，拆除过祖父房间里的隔扇；他从学校退休，因为房子漏雨越发严重，便将卧房移到楼下厅堂，从楼梯处隔断，辟作独立一间。因论证与正文类似，不再赘述。

³³ 这段话化用的是弗罗姆（Fromm, 1900-1980）在《逃避自由》中所写的：在人的个体化进程中，孤独日益加深……个人独立存在个人独立存在，与世界分离；与世界相比，个人觉得世界强大无比，能压倒一切，而且危险重重，由此，他产生一种无能为力感和焦虑感。参考：【美】弗罗姆，《逃避自由》（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页23。

³⁴ 王安忆，《考工记》，页127。

³⁵ 王安忆，《考工记》，页135。

³⁶ 梁思成（1901-1972），《清式营造则例》（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1），页7-8。

³⁷ 「金」可以拿来制造兵器，具有砍伐的作用。参考王文娟，〈五行与五色〉，《美术观察》，2005年第3期，页84。

的人和事，与他有关又无关，又近又远，有它们在，妨碍不到他，若没有它，他就要寂寥了。³⁸

可见在这个时期，建筑结构上固然受到了破坏，却帮助陈书玉抵抗了虚无、恐惧，保存自我。这是实用理性思维很重要的特点：强调在变化中取得和谐、均衡和稳定。³⁹换言之，变动、破坏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如何在变动和破坏中维持现实的稳定的生活。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作家对于日常生活的关注。王安忆认为，在生活浮泛的声色下，其实有一些基本不变的秩序。这个秩序往往简单质朴，嵌在了巨变的事端的缝隙间，因为司空见惯，所以看不见。然而，最终决定运动方向的，却是它们。⁴⁰在《考工记》的许多地方，作家都强调过这一点。回归到“人生建筑”上，我们发现日常生活让宅子是一个空间的同时，又在某个部分，让陈书玉实践出一个“地方”，使得建筑意涵变得“含混”。

四、1976年—1990年：向死而生的人生建筑

1976—1990年间，政治运动虽然已经结束，威胁房子合法性的一切因素也都退去，然而建筑已经破败不堪，四处漏风，顶上的瓦盖碎了无数出。⁴¹几年后，瓶盖厂迁空了，房产回归陈书玉，空旷重新回来。大虞来看陈书玉，只见轿厅、花厅、过廊、天井，经过瓶盖厂一建一拆，连轮廓都模糊了，另外，“天井变小，院墙房屋颓圮的缘故。门楼上的砖雕风蚀得厉害，变成一种灰烬的颜色。主楼有他住着，所以不至于溃决，勉强可支撑”。⁴²

可见除了陈书玉一直“烦恼”（海德格语）的主楼，这座建筑即将彻底死去。⁴³于是未来的二十年，陈书玉最想做的是挽救它的“死亡”，其实也是挽救他自己的“死亡”。本文曾提及年轻时的陈书玉抗拒任何有关死亡的虚无思

³⁸ 王安忆，《考工记》，页189。

³⁹ 中国的实用理性依存人的历史实践，有赖于人在实际经验中去准确把握和发现，它非但不排斥变化，甚至强调在变化中取得和谐、均衡和稳定。李泽厚：《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页30。

⁴⁰ 原文是：“在浮泛的声色之下，其实有着一些基本不变的秩序，遵守着最为质朴的道理，平白到简单的地步。它们嵌在了巨变的事端的缝隙间，因为司空见惯，所以看不见。然而，其实最终决定运动方向的，却是它们。在它们那里，潜伏着一种能量，以恒久不移的耐心积蓄起来，不是促成变，而是永动的力。所以，它们并不是像表面看起来那样安静，是有着充沛的活力，执着的决心。它们实在是相当丰富的，同时，又是单纯的。它们便是艺术尽力要表现的”。王安忆，《小说家的读书密码》（台北：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页77。

⁴¹ 王安忆，《考工记》，页237。

⁴² 王安忆，《考工记》，页254。

⁴³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认为日常在世的存在是在世界中与世界内的存在者打交道，也就是「烦恼」。最切近的交往方式并非一味地进行觉知的认识，而是操作着的，使用着的烦恼，海德格认为，烦恼有它自己的「认识」。烦恼一向是和用具相契合的，也唯有在烦恼之际，用具才能按本来面目在它的存在中显现出来。在此，海德格以「上手状态」来命名这一此在让自己显现、同时也让在者显现的过程，而最后，众多显现出来的在者能够勾连为一个世界，即此在最切近的世界。【德】海德格著，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页82-86。

考，何以在这时节开始面对死亡？一方面，这当然和陈书玉的逐渐年迈有关，死亡已经变成切近的事。然而另一方面，笔者以为这仍然要联系到“人生建筑”的实用理性思维之上。我们一再提及，人生建筑是为了现世的生活而存在，建筑的兴废象征着家族的兴衰。如果陈书玉的族人仍在，陈书玉膝下子孙成群，那么建筑就不至于颓败，陈书玉或许也能像他祖父当初那样，在房子里举办六十大寿、七十大寿、八十大寿，在有限的生命里乐观地期许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但是祖宅的凋敝状况，意味着现世的福祉已经穷尽，不再有筹划的可能。

实用理性指导下的福祉失效的同时，现代的“自我”也面临覆灭。在小说中，此时的上海已经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陈书玉的大半生，都不曾在某条路上散过步，也不去什么场合娱乐，他所熟稔的上海，已经随着“西厢四小开”的离去而离去了。没有什么朋友，外面的世界又是彻底的陌生，唯有这座建筑，是熟稔而安全的。如果它被彻底毁灭，他要去哪里寻找熟悉的生活经验，并肯定自我的存在呢？罗素·W·贝尔克问：什么原因能解释获取和收藏另一个时代、地方和家庭的古董和古物呢？显而易见，除了最广泛意义上的身份以外，这也是为了归属于我们相信曾拥有一整套好的特性或价值的一个时代、一个地方或一个人。⁴⁴ 无论是地方的角度还是物品的角度，说的都是一个道理，总之，如果建筑毁灭了，陈书玉的自我也就面临倾覆的危险。

可以说，在“传统”和“现代”的意义上，陈书玉都被迫面对着“死亡”。他不是没想过逃避，某种程度上，我们仍能将从陈书玉后来挽救物质上的房子的行为视作某种意义上的实用理性精神，因为死亡是虚无的，挽救房子的行动却是具体可感的。但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人生建筑的悖论。

陈书玉为了挽救房子付出了很多努力。一是他尝试求助于机关部门。然而向房管局报修，回答说是私房，自家处置；被推举为政协委员，在政协活动中发言，报告老宅之事，又写成文字，提奖优秀文案，得电饭锅一具，却无下文；瓶盖厂面临倒闭，他再写报告，郑重声明：“房屋整顿完毕，自愿缴给国家，为沪上老城增添一景”，⁴⁵ 石沉大海，没有回音。不少学者将陈书玉的尴尬视作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尴尬处境的表征，可是从人生建筑的角度看，中国人没有以建筑代表永恒的观念，也没有使建筑永远流传下去的观念。在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之际，大多废弃旧宫，改建新殿，甚至以火焚烧上代宫殿，彻底消除上代的痕迹。⁴⁶ 因此，《考工记》中相关机关部门的态度也不难理解。进而我们可以发现，陈书玉出于实用理性而想要挽救房子，而人生建筑本身的实用理性精神，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又不允许他实现这样的心愿。

就此，从客观上而言，陈书玉不得不面对死亡了。那么他如何应对呢？是他有了为祖宅虚构传记的想法。既然要立传，就得有个名字。小说早就告诉我们

⁴⁴ 罗素·W. 贝尔克著，〈财产与延伸自我〉，《物质文化读本》，页 130-131。

⁴⁵ 王安忆，《考工记》，页 252。

⁴⁶ 汉宝德，《中国建筑文化讲座》，页 252。

了，这座建筑名为——“煮书”。行文至此才提出这点，是因为笔者认为，只有到了这个时候，“煮书”于陈书玉，才是真正的“煮书”。对事物进行命名，不是一个简单的活动。学者周光庆认为：

每一种事物都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只有当它与人发生关联并成为人的认识对象，只有当它具有名称并进入语言，它才能变得可以理解，才能向人表现自己的存在，才能具有特定的意义。如果说，事物的意义体现了人与事物的多重关系，构成了人与世界交往的基本方式，是人生存的不可或缺的前提，那么，语词符号则是人与事物多重关系的中介，是人与世界交往的中介，因而同样也是人生存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前提。⁴⁷

“煮书”本义是对书本进行反复的阅读、钻研，以达到对内容的透彻了解之目的，放在建筑上，就是对建筑进行类似的阅读。如果说“煮书”是陈书玉与宅子联系的中介，是宅子向它的主人显现的意义，那么我们要问，这个意义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是家族传说。

在小说《纪实与虚构》里，王安忆反复提及自己作为一个移民到上海的同志家庭的一员，对自己“无根”的状态究竟有多无助，她非常羡慕自己的某些同学，能够清晰地讲述自己的家族神话，在这里，作家说：“家族神话是一种壮丽的遗产，是一个家庭的文化与精神的财富，记录了家族的起源。起源对我们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使我们至少看见一端的光亮，而不致陷入彻底的迷茫。没有家族神话，我们都成了孤儿”。⁴⁸为了寻求这光亮，王安忆决心通过溯源母亲独特的姓氏——“茹”——为自己的家族神话命名，它的名字就叫柔然。⁴⁹

与作家本人不同，陈书玉从一开始就不欠缺家族传说，只是对这些传说，在建国前还来不及认可，建国后又急于摆脱，只有到了这向晚的时节，历史已经积累了厚厚一迭，翻了篇，他才有了“读”它的心力与机会：他将家屋各处都封起来、真正地退到“日睡三尺”，跟着日升日落的光影，追踪建筑的美，与东墙上的浮雕人物，渐渐有了交情……他终于不再害怕空旷和孤寂了，相反，因为“煮书”，他还得了乐趣。⁵⁰

那么，具体如何给家族立传呢？原来这个时期，时常有人来他家参观。他从做绘图作业的土木系学生手里，要来了“煮书”的平面绘图复印件，装入镜框，与房契并列在墙上。之后，他楼上楼下，搜罗每一个细节，祖父甚至曾祖父的几封短筒啦，几页豆腐帐啦（豆腐帐里又有他和祖父相处的历史），若干旧照片

⁴⁷ 周光庆，〈汉语命名造词的哲学意蕴——兼论任意性与可论证性的争议〉，《语言文字运用》，2004年第1期，页27。

⁴⁸ 王安忆，《纪实与虚构》（台北：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6），页75。

⁴⁹ 王安忆，《纪实与虚构》，页77。

⁵⁰ 王安忆，《考工记》，页260。

啦，祖父的文凭啦，全部送去翻印，送入镜框。“这些鳞爪东一片西一片，拼凑他的家族史。他还是看不清，但有什么要紧呢？”⁵¹

的确，像王安忆可以通过虚构柔然的传奇纪录自己家族的起源，陈书玉何尝不能够？书里写他将长辈们透露的鳞爪，这里一点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皇帝恩准啦，四库全书啦，八仙故事啦，“半水楼”和“煮书”，也不管正史野史，八卦流言，玄虚和前后相冲的地方，加上诠释和虚构，最终连贯成情节，说给老校长的儿子阿小听——完全就是《纪实与虚构》的另一种翻版。⁵²

其实“考工记”一词，直接来源于古籍《周礼·东官·考工记》。这本官方营造手册开头，开宗明义地提出了“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的技术观。⁵³如果说，在现实层面上，陈书玉的确无能为力，那么通过虚构，也不失为“巧者述之守之”意义上的一种安慰。

除了勤勉地立传外，小李也来找过他，房子修复有望，却又毁在那些繁琐的手续和欲望没有穷尽的兄弟姐妹乃至于姑婆的过房女儿手上。利益的撕扯导致一切都无限期地延宕下去，后来懂这“煮书”插榫方法的大虞过世，陈书玉伤心欲绝。房子的事回到原点，甚至更糟。后进的屋子全面崩塌，木料让人拖走了大半，因为这一带要拆迁，划进商圈，私房主门都忙着找木材搭建，扩充面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可是这些好木料怎么能拿走呢？于是每日里他都巡查一遍，将散下来的木头拖进东边的车间里。有几次，和人起了冲突，小说里写：

他和邻人各持木板两端，拔河似的拉过去拉过来，对方陪着笑脸，既而晴天转阴霾，恶语骂道：房子坍下来，压死你！他不回骂，也不放手，硬是抽过来，转身拖进废旧车间，地面上也有了小小一摊。⁵⁴

以沉默、坚忍、固执的姿态，聚积这样“小小一摊”渺小的、反抗死亡的愿望，令人想起海德格关于“向死而在”的论述。

海德格认为，死亡是此在最本己的可能性。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才能将此在从沈沦中彻底惊醒。死亡并不是无差别地属于自己，死亡是把此在作为个别的东西来要求此在，这种个别化表明了，事涉最本己的能在时，一切寓于所烦恼的东西的存在与每一共他人同在都是无能为力的。只有当此在是由它自己来使它自身做到这一步的时候，此在才能够本真地作为它自己而存在。⁵⁵

我们已经论证过，“煮书”的死亡就是陈书玉精神上的死亡，而正是这种对死亡的面对，陈书玉为自己的存在的可能性做出筹划。他不选择像周围的居民那样，喜滋滋地等待拆迁带来的利益；过去和小李交涉时，也不曾和其他亲戚

⁵¹ 王安忆，《考工记》，页 261。

⁵² 王安忆，《考工记》，页 242-243。

⁵³ 杭间，〈总序〉，戴吾三著：《考工记图说》（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页 17。

⁵⁴ 王安忆，《考工记》，页 275。

⁵⁵ 海德格，《存在与时间》，页 315。

一样企图通过房子大捞一笔。他想要实现的可能性，是事无巨细地在家中搜罗历史的细节，就算拼凑出来的家族史十分拙劣；是让眼前的废墟恢复昔日的姿容，保存好一段既属于自己也属于这个国家的历史。在此，人性“知其不可而为之”、“向死而生”的高度便显现出来了。即便这座建筑日后仍无法被修复，陈书玉能做的，就是日日清扫房子及周围街区，眼看着四面高楼让原先像礁石一样的“煮书”成为了城市的锅底。但这个结局在《考工记》中已经不再重要，毕竟人已经穿越时间空间，磨砺修炼了自身。

五、结语

本文通过陈书玉的人生经历，阐述了现代中国人与中国古典建筑之间唇齿相依的关系。第一章节分析了陈书玉如何在和家人相处的过程中，在动乱的时局中，让家屋由空间变为地方；第二章节则主要探讨具备实用理性的人生建筑如何在政治运动中被损毁，却又同时保护了人的日常生活；第三章重点则在于分析人在挽救人生建筑时，中国传统实用理性精神的可能与不可能，进一步阐发人与建筑向死而生的存在姿态。

可以说，建筑是《考工记》非常突出的主角，王安忆善写物的功底在这本小说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但也可以说，“存在”才是王安忆最关注的命题。借由建筑的命运，王安忆凸显的是人“存在”的命题：人如何面对“被抛”的孤独焦灼处境，人如何面对时代、文化的常与变？套用郅元宝多年前的话来说，就是王安忆擅长书写存在之“烦”，这种“烦”的实质性内容，往往是对自己“来历”的焦虑不安。这里的“来历”远远超过了祖宗血缘的范围，联系着面对生命、社会、自然、时代、历史、文化与整个存在时，人油然而生的那种对终极价值的关怀和到根基出栖身的企愿。⁵⁶而也就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发现王安忆的小说是很难一步到位分析完成的，因为她需要借由大量的情绪书写来凸显人的存在状况，因而出现了无数难以穷尽的心理细节。另一方面，我们又能理解为何王安忆的小说总是和大历史若即若离。比如在《考工记》中，我们很难看到作家对于历史、变革的批判姿态，甚至看不到多少政治运动的名字。淡化大历史的目的，无疑是为了凸显人的存在的问题、应对的姿仪。

⁵⁶ 郅元宝，〈人有病，天知否？——王安忆的“存在之烦”〉，郅元宝著：《拯救大地》（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页144。

【征引文献】

一、专著

- 王安忆：《纪实与虚构》，台北：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6。
- 王安忆：《考工记》，台北：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8。
- 王安忆：《空间在时间里流淌》，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
- 王安忆：《小说家的读书密码》，台北：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
- 汉宝德：《中国建筑文化讲座》，上海：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6。
- 李泽厚：《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北京：三联书店，2008。
-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三联书店，2008。
- 孟悦，罗钢主编：《物质文化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郅元宝著：《拯救大地》，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
-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 施宣圆主编：《上海 700 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 梁思成：《清式营造则例》，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1。
- 戴吾三：《考工记图说》，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
- 【英】阿兰·德波顿 (Alain de Botton) 著，冯涛译：《幸福的建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 【法】列斐伏尔 (Henri Lefebvre) 著，李春译：《空间与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 【英】迈克·克朗 (Mike Crang) 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译：《文化地理学》，台北：巨流图书有限公司，2003。
- 【美】韩起澜著，卢明华译：《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 【美】弗罗姆：《逃避自由》，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
- 【美】段义孚 (Yi-Fu Tuan) 著，王志译：《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 【德】海德格 (Heidegger) 著，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上海：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97。
- Tim Cresswell 著，许苔玲、王志弘译：《地方：记忆、想象与认同》，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6 年。

二、论文

- 周保欣：〈“名物学”与中国当代小说诗学建构——从王安忆《天香》《考工记》谈起〉，《文学评论》，2021 年第 1 期，页 67-75。

周光庆：〈汉语命名造词的哲学意蕴——兼论任意性与可论证性的争议〉，
《语言文字运用》，2004年第1期，页26-33。

杨奎松：〈新中国巩固城市政权的最初尝试——以上海“镇反”运动为中心的历史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页1-20。

蔡亮：〈近代上海棚户区与国民政府治理能力〉，《史林》2009年第2期，页23-30。